



陶寺遗址出土的多环联璧。

卢鹏宇摄



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。

卢鹏宇摄

1月1日上午，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博物馆前，观众排起了长队。博物馆推出背诵《尚书·尧典》或《五帝本纪·尧》全篇免门票活动。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……”一名小学生用时1.5分钟挑战成功，赢得大家鼓掌称赞。

“陶寺遗址有不少考古发现与这两篇古文记载相契合，希望通过背诵经典的方式，让大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深入了解陶寺文明的独特魅力。”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负责人成丽霞表示。

陶寺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，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，其考古新发现、研究新进展为古史探索提供了新材料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兼收并蓄、连绵不绝特质的有力实证和生动写照。

不久前，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，全面展现了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都城的璀璨文化和恢宏气象。

汇聚重点文物

从空中俯瞰，陶寺遗址博物馆外观呈“中”字形，象征着陶寺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、发展的重要作用。

步入大厅，两大大型浮雕墙映入眼帘，右边雕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个典型都邑遗址——良渚、陶寺、二里头、石峁的代表性文物，左边雕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元素。“整体表达的是站在陶寺看早期中华文明，再由中华文明看世界文明。”陶寺遗址博物馆副研究员刘甜介绍说。

博物馆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，基本陈列以“光被四表 协和万邦”为主题，分为“文明蕴化”“煌煌都邑”“早期国家”3个单元，并特设考古专题展厅，汇聚陶器、玉器、铜器、漆木器等文物230件(套)，生动展示了陶寺遗址在城址规划营建、手工业制造、艺术创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。

步入“煌煌都邑”展厅，一件玉璇玑引人注目，这是2024年陶寺遗址中期墓地新出土的文物之一。“它的外缘有齿牙，推测是用来观测天象的，具体功能还有待研究。”刘甜说。

陶寺中期玉墓M22出土的圭尺首次公开亮相。这是一件黑、绿、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，与早期贵族墓葬M2200出土的立表配合使用，应是古代天文历法观测仪器。

展柜旁的电子屏上播放着用圭表测日影的演示动画：圭尺平放于地，立表垂直竖立，正午时刻，阳光照在立表上，投下的影子可用圭尺上的刻度测出长短。

《周礼》记载，建王都必在“地中”。圭表测量的夏至日影长度正是测定“地中”的标准。陶寺圭尺从头端到第11格刻度长39.9厘米，合陶寺1.6尺(专家研究认为陶寺1尺为25厘米)。1.6尺与《周髀算经》记载“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”的“地中”标准吻合，说明陶寺已经存在“地中”概念。

展厅中还展出了铜齿轮形器(复制品)、沙漏(复原品)等器物，它们可能是计时的工具。有学者推测，陶寺先民已能精准管理时间与空间，为王权和社会服务。

彩绘蟠龙纹陶盘是陶寺遗址核心文物之一。陶寺遗址共出土4件龙盘，此次展出的龙盘原件出土于早期大墓M2001，是体量最大的一件。此盘褐色胎，器表灰色，内壁以红白两色绘蟠龙纹。陶寺龙盘纹饰具有以下特点：均是蟠龙，盘曲如蛇；身体上有鳞状斑纹，似鳄；口衔枝状物；有的头部两侧方形似耳，有的带锯齿状牙齿。

朱书扁壶是陶寺又一代表性文物。扁壶为泥质灰陶制成，是陶寺常见的汲水器，壶上有红色朱砂书写的两处字符。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字，其中一个为“文”字，另一个字有“尧”“命”“邑”等多种解释；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某种符号。

展现都城气象

陶寺遗址1958年发现，1978年正式开启考古发掘，至今仍在持续。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，其中城址面积280余万平方米。

21世纪以来，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，陶寺遗址确定了中期大城、宫城及官城、仓储区、中期大型墓地等重要遗迹，其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加清晰。

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，大致经历了兴起、繁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。陶寺文化早期就开始筑城。

到了中期，城址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：宫城继续沿用，增建了外郭城，城址面积达到280余万平方米，完成了由单一宫城向“宫城—郭城—双城制”的转变。

陶寺中期城址复原模型沙盘前，通过空气成像技术，再现了陶寺城址的景象：“回”字形城址内功能分区齐备，城内西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正在烧陶，河水潺潺流动，先民耕种劳作……

陶寺文化晚期，以陶寺为中心的政权被外部势力征服，有专家认为可能是被西北方向500公里外、以陕西神木石峁为中心的势力击败，大城墙逐渐被毁，宫城衰败，仓储区已不存在。陶寺遗址逐渐成为普通聚落，并最终废弃。

陶寺先民十分重视农业生产。展厅里陈列着陶寺遗址出土的粟、黍、稻、豆等炭化种子，还有“仓储”窖穴、凌阴建筑、水井等复原图，体现了陶寺农耕文明的发展。“陶寺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酒器等，反映出当时农业丰收、物阜民安的社会风貌。”刘甜说。

陶寺文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显著，阶级分化明显。考古人员在早期遗址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完成1309座墓，其中5座大型墓葬集中分布，有大量随葬品，许多小型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。不同阶层的居住形式也有明显差别。展厅里有一组房屋复原模型，直观地展示了住所的差别：平民住窑洞或半地穴式单间，下层贵族的住宅是双开间浅地穴，王则在夯土台上建立宫殿。

陶寺统治者“以礼治国”。在“礼乐文明”展区，摆放着铜铃、鼗鼓、土鼓、石磬等文物及复原件，激活多媒体设备，便能欣赏陶寺乐器奏出的悠扬乐音。

陶寺遗址出土了陶、玉、石、漆木、铜等材质的礼仪用器。展厅里有一件小小的铜铃，最宽处仅2.7厘米，



观众参观陶寺遗址博物馆。

陶寺遗址博物馆供图

陶寺遗址· 印证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

本报记者
刘鑫焱
付明丽



参观者在展厅中欣赏文物。

陶寺遗址博物馆供图



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璇玑。

张超宁摄

对角长约6厘米，表面可见气孔。“这件铜铃不简单。”刘甜介绍，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复合范铜器和铜乐器。陶寺遗址共出土了7件铜器，属于不同器类，其中，铜铃和铜璧形器采用了复合范铸造技术，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打下了技术基础。

在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，1对鼗鼓、1件石磬、1件土鼓构成固定组合，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墓葬里都出现了这样的组合，且数量和摆放位置一致。“可见陶寺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礼制，这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刘甜说。

陶寺遗址已被确认是一处古国时代的都城，有最高统治者。不少学者认为，这里很可能是尧政权之都。据文献记载，尧都在临汾一带。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献中的一些细节吻合，如观象台与“观象授时”、圭尺与“允执厥中”、鼓舞乐器与“命质为乐”等。

陶寺究竟是不是尧都？也有学者认为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阐释考古成果

刻有纹饰的白灰墙皮、灰陶材质的板瓦，展厅里这些建筑材料都出土于陶寺遗址宫城。

陶寺遗址有宫城、仓储区、墓地、观象祭祀区、手工业作坊区、普通居住区等明确的功能分区。其中，宫城作为大型都邑遗址最核心的功能区，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
自2013年至2017年，历时5年的考古调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。2018年以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对宫城内

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——1号宫城基址进行发掘，基本摸清了1号宫城基址的规模、年代、堆积情况、布局结构等，对其性质有了初步了解。

展厅里以图片和模型的形式介绍了1号宫城基址的情况：它位于陶寺遗址宫城内地势略高的东南部，大体呈长方形，面积近6500平方米，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。“1号宫城建于陶寺文化中期，它是朝会布令的殿堂，还是祭祀天地祖先的庙宇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”刘甜说。

1号宫城基址之上发现2座主殿、东侧附属建筑、中部庭院、东部疑似廊庑等，结构复杂，布局规整，在史前时期遗址中比较罕见。其主殿D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。

主殿D1坐北朝南，长约26.8米，宽20.3米，总面积540余平方米，其间残存3排18个柱洞，柱网结构比较清晰。初步判断，该建筑东西面阔7间，也可能分为东、西两个宫室，每个宫室均面阔3间，中间为过道。

主殿D1以东两米处，发现了一座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，其东南又有两座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型房址，西部发现一道夯筑较好的“U”形墙垣。它们都是主殿D1的附属建筑，功用还不太明确。“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雏形。”刘甜说。

1号宫城基址出土了陶器、骨器、玉器、铜器等小型器物120余件。其中一件铜璧形器，形似玉璧，器体上有两周共28个小长方形穿孔，形制特殊，十分罕见。在叠压1号宫城基址的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了一件磨制精细的玉笋。专家指出，这类器物在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中比较常见，反映了陶寺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。

在1号宫城基址西侧还有2号夯土基址。2022年以来，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发掘，大体揭露了该基址的面貌。2号夯土基址面积近600平方米，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，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中期，晚期时废弃。在此发现规整灰坑3处，推测为祭祀坑、窖穴或蓄水坑。坑底发现陶器2座，印证了陶寺晚期该基址彻底废弃，成为普通生产生活区。2024年，在其西北角外发掘清理了8座小型墓葬，为一处陶寺文化晚期墓地，目前正在使用科技手段进行族群分析，或对陶寺族群认同研究有重要意义。

探源中华文明

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当天，“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”学术研讨会在襄汾举办，30余位考古文博专家齐聚一堂，探讨陶寺文明的内涵和意义。

“大规模的城址、宫殿建筑，出土的玉器、铜器以及写有文字的一些文物，都证明了距今4300年前后，黄河中游地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。”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表示。

“陶寺文明在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、教授张海说。

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，陶寺文明处于什么地位？这要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。

2002年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，围绕浙江余杭良渚、山西襄汾陶寺、陕西神木石峁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大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，实施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。

何以判断进入文明社会？不同于西方学界基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考古成果得出的“文字、冶金和城市”三要素说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了中国方案：一是生产发展，人口增加，出现城市；二是社会分工，阶层分化，出现阶级；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。

陶寺遗址发现了都城、宫殿、王族大墓、礼器等，已形成城市和阶层分化，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。由此可见，陶寺遗址具备了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志。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显示：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，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。其中，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为古国时代。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约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3800年。专家普遍认为，这一时期，之前较为发达成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良渚文化、石家河文化等，由于自然灾害、战争等原因，社会发展陷入停滞；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，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，进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。

陶寺文明就处在这个阶段，广泛吸收多种文化元素。“M22墓中出土的玉琮、玉璧、玉钺、石钺以及玉兽面等，均非源于本地，而是吸收融合了红山、大汶口、良渚的玉器文化。”刘甜说。

陶寺城址总面积280余万平方米，现在只发掘了3万多平方米。目前，在山西省文物局统筹协调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山西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，继续探寻陶寺遗址的文明密码。

2021年，陶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《大遗址保护利用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》。襄汾县宣传部部长李之炜介绍，当地将持续推进陶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示范区、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、陶寺文化艺术创意园等建设项目，更好地挖掘、阐释、传播陶寺遗址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